

· 百 家 园 ·

试论晋唐、明清时期瘟疫预防外用方药的同异

姚 伟¹ 赵向东¹ 王晓栋¹ 刘菊容¹ 李 波¹ 冯全生^{2*}

(1. 泸州医学院附属中医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忠山, 646000; 2. 成都中医药大学温病教研室)

* 通讯作者: fengqs118@163.com, 13688120528

[摘 要] 瘟疫为具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广泛流行的急性传染病, 中医文献中称为“疫”、“疔”及“鼠疫”、“时气”等。通过对晋唐和明清医学文献中瘟疫预防方法、方药的研究, 发现明清时期的防疫用药是在晋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晋唐时期侧重于祛邪辟秽药物, 明清时期更集中和侧重于芳香辟秽药物的使用。研究提示, 芳香类药物在疫病预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 瘟疫; 预防用药; 外用方药; 中药剂型; 芳香类药物

疫,《说文解字》解释为:“民皆疾也”^[1]。瘟,《辞源》解释为:“疫病,人或牲畜家禽所生的急性传染病”。瘟疫,即具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广泛流行的急性传染病。《中国疫病史鉴》认为,除“疫”、“疔”以外,古代文献记载中已经被确认属于疫病的有“痘”、“大头瘟”、“羊毛瘟”、“烂喉痧”、“吊脚痧”、“鼠疫”、“疟疾”、“痢疾”等,另外,“伤寒”、“时气”、“温病”中部分注明传染或流行特点者也属于此范畴^[2]。晋唐和明清医学文献中瘟疫预防的记载相对全面、集中,能代表中国古代瘟疫预防的概况。

药物外用是晋唐和明清时期瘟疫预防的重要途径。使用方式多样,主要有佩戴、烧熏、涂抹、塞鼻、取嚏、点眼、涌吐、粉身或洗浴等;剂型主要包括散剂、汤剂、丸剂、酊剂等。

1 悬挂、佩戴

药物悬挂、佩戴是指以绛囊、绢帛或红布包裹药物,悬挂于门户、帐前或带于手臂、头顶。

1.1 单味药物

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二月一日,取东行桑根,大如指,悬门户上,又人人带之”^{[3]43}。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赤散辟温疫气伤寒热病方》曰:“以丹涂之,悬门户上,又令人带之”^{[4]176}。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延年秘录辟温方》^[5]所载用药同《备急千金要方》。但《神农本草经》及《新修本草》记载桑根白皮并无辟疫的功用,到明清时期未再使用。真降香,又名“紫藤香、鸡骨香,……慎微曰降香出黔南,……辛温无毒”^{[6]1366}。自明代开始用于瘟疫的预防。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木部第三十四卷》中论:“烧之,辟天行时气,宅舍怪异,小儿带之辟恶气”^{[6]1366}。张景岳认为,“治天行时气,宅舍怪异,用

真降香烧焚,大解邪秽,小儿带之,能解诸邪,最验”^{[7]284}。清代刘奎亦视降香为辟温疫秽浊的首选药物。

其他辟疫的单味药物还有雄黄、马尾松等。明代王肯堂曰:“以明雄黄一块重五钱,以绢帛包系头顶心亦妙”^[8];清代刘奎指出:“悬挂马尾松枝,可免瘟疫”^{[9]211}等。据本草记载降香辛温,雄黄辛平有毒,都是芳香正气之品。

总的来说,晋唐用于佩戴辟疫的单味药物主要有女青、桑根和马蹄屑;明清除继承之外,多种香料开始用于疫病的预防。

1.2 复方

复方药物佩戴在中国古代运用较多。晋唐使用较多的方剂有老君神明白散、太乙流金散、赤散、虎头杀鬼方等祛邪辟秽方剂,明清在继承之外,出现了除秽靖瘟丹等预防用方。

老君神明白散记载于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曰:“术一两,附子三两,乌头四两,桔梗二两半,细辛一两,……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此带行所遇,病气皆消”^{[3]42}。全方用药辛温芳香,辟疫气不得近。

太乙流金散祛邪辟秽、辟虫毒恶鬼不祥。晋唐时期,太乙流金散命名、组方较统一,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载有太乙流金散,曰“雄黄三两,雌黄二两,矾石、鬼箭各一两半。羚羊角二两。捣为散,三角绛囊,贮一两带心前并门户上”^{[3]42}。清代刘奎在《松峰说疫·避瘟方》中将该方各药剂量减半,认为其大避瘟疫^{[9]216}。清代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瘟疫源流》则去雌黄^{[10]533}。组方中羚羊角、鬼箭羽性寒,雄黄、雌黄、矾石味辛具

有芳香之性。

赤散一名藜芦散,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九》中载:“赤散辟温疫伤寒热病方”曰:“藜芦、踯躅花各一两,附子、桂心、真珠各六铢,细辛、乾姜各十八铢,牡丹皮、皂荚各一两六铢,右九味,末之,内真珠合治之,分一方寸匕,置绛囊中带之,男左女右,著臂自随”^{[4]176}。

虎头杀鬼方以《肘后备急方》虎头丸为基础,在各个时期加减不同药物以成方。《肘后备急方》组方为:“虎头骨五两,朱砂、雄黄、雌黄各一两半,鬼臼、皂荚、芫荽各一两。捣,筛,以蜡蜜和如弹丸,绛囊贮系臂,男左,女右,家中悬屋四角,……一方有菖蒲、藜芦,无虎头、鬼臼、皂荚,作散带之”^{[3]42-43}。清代刘奎在《松峰说疫·诸方·避瘟方》中记载的“杀鬼丹”是在虎头骨、雄黄和朱砂的基础上,加桃泉、斧头木、桃仁、犀角屑、木香、白术、鬼箭羽、麝香等多种芳香辟瘟的药物^{[9]213}。

到明清芳香药物佩戴的预防疫病更全面。《验方新编》有“辟瘟防护保身良法”^{[11]318-319},除雄黄、朱砂外,加入了苍术、北细辛、牙皂、紫红降香、檀香、甘松、广木香、公丁香、丹参、排草、山奈、麝香五厘、冰片三分。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辟邪丹加赤茯苓、人参、鬼箭羽、菖蒲、远志肉、白术、苍术、麝香^{[10]537}。刘奎《松峰说疫·除秽篇》自拟“除秽靖瘟丹”更是集中使用大量芳香正气药物^{[9]63},曰:“苍术、降真香、川芎、大黄(各二钱)、虎头骨、细辛、鬼箭羽、桃泉(小桃干在树者)、白檀香、羊躑躅、羌活、甘草、草乌、藁本、白芷、荆芥、干葛、猬皮、山甲、羚羊角、红枣、干姜、桂枝、附子、煅灶灰、川椒、山奈、甘松、排草、桂皮(各一钱,共为粗末)、明雄(二钱)、朱砂(二钱)、乳香(一钱)、没药(一钱,四味另研,共和)……倘瘟疫之乡,果能焚烧佩戴,则不觉,秽气之潜消,而沉痾之顿起矣”。更有完全以芳香辟秽药物组成的防疫方剂,如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苏合香丸,曰:“木香、沉香、麝香、丁香、檀香、安息香熬膏、白术、犀角、香附、荜拨、朱砂半为衣各二两,乳香、冰片、苏合油入安息膏内各一两,安息膏丸,每两分作四十丸,每取二三丸水酒任下”^{[10]537}。郑肖严《鼠疫约编》载:“避疫香粉、生大黄(钱半)、甘草(五分)、皂角(一钱)、丁香(二钱)、苍术(一钱)、檀香(二钱)、山奈(一钱)、甘松(二钱)、细辛(一钱)、雄黄(一钱)。共研末,用绢小袋,佩戴身上”^{[12]65}。

综上所述,晋唐趋向于虎头骨、雄黄、朱砂等具驱邪避疫药物的使用;明代防疫用药主要在此基础

上加入芳香辟秽药物;而清代在明代用药基础上更注重芳香正气药物的使用,或直接以芳香辟秽药物组方。

2 烧熏

烧熏是将药物燃烧,取其烟气上熏以达防疫目的一种药物外用方法。药物烧熏起效快,作用范围广,在历代疫病的预防中运用广泛,是历代瘟疫预防的重要手段之一。

2.1 单味药物

艾叶烧熏在瘟疫预防中的运用最具代表性。《新修本草》云:“艾叶,味苦,微温,无毒。主灸百病,……一名冰台,一名医草”^[13]。《本草纲目》曰:其又名“黄草、艾蒿”,“捣汁饮,治心腹一切冷气、鬼气,……止霍乱转筋,痢后寒热”;“治伤寒时气”^{[6]848-849}。刘奎《松峰说疫·诸方·避瘟方》载:“断瘟法:密以艾灸病人床四角,各一壮,勿令人知,不染”^{[9]209}。

降香从明开始用于瘟疫的预防,并为医家一致认为烧熏防疫的最佳药物。张景岳认为,“治天行时气,宅舍怪异,用真降香烧焚,大解邪秽,小儿带之,能解诸邪,最验”^{[7]284}。刘奎赞其“天行时气,宅舍怪异,并烧降真香有验”^{[9]211-212}。为预防瘟疫的最佳烧熏药物,并自定“苍降反魂香”,曰“苍术降真香(各等分)共末,揉入艾叶内,绵纸卷筒,烧之,除秽祛疫”^{[9]64}。同时指出:“烧青木香、薰陆、安息胶香,可避瘟疫”^{[9]211-212}。关于苍术,黄宫绣《本草求真》说:“甘苦辛烈,气温无毒,……辟恶。时珍曰:陶隐居言术能除恶气,弥灾沴,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14]。

综上所述,艾叶在中医防疫的应用历史悠久,并一直为历代医家推崇;降香则是自明以来公认的具有良好辟秽作用的药物之一。同时自明代开始苍术等芳香药物也为医家所用。可见芳香药物是烧熏防疫的重要选择。

2.2 复方

烧熏防疫的复方以太乙流金方、杀鬼丸及辟瘟丹为代表。太乙流金方在自晋到清的使用过程中,除了悬挂和佩戴,主要烧熏以避免瘟疫的传染。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以“捣为散,……月旦青布裹一刀圭。中庭烧温,病人亦烧熏之,即瘥”^{[3]42}。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所载太乙流金散与《肘后备急方》同^{[4]175},唐代王焘则在《外台秘要》中将雌黄剂量变为三倍^[5],同时即使是烧熏,清代刘奎照常将其剂量进行了很大的压缩^{[9]216}。

辟瘟丹自明代开始出现,盛行于明清,预防瘟疫传染的系列方剂。《本草纲目·芳草五十六种》集中记载了川芎、篙本、羌活、独活、白芷、木香、白豆蔻等药物,卷十五至十六陆分布艾、青蒿等等。《本草纲目·香木三十五种》汇集了柏、松、杉、丁香、降真香、檀香等芳香木本植物。各医书往往将其中几种或十几种芳香类药材组合成方,如明代龚信《古今医鉴》载“神圣辟瘟丹:苍术为君(倍用),羌活、独活、白芷、香附、大黄、甘松、三奈、赤剑、雄黄各等分。……正月初一平旦时焚一炷,辟一岁瘟疫邪气”^{[15]84}。清代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引用喻嘉言论治瘟疫,曰“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宜屠苏饮、太仓公辟瘟丹、七物赤散)。邪既入,则以逐秽为第一义”^{[10]528-529}。并载太仓公辟瘟丹^{[10]532}“苍术八两,白术、乌药、黄连、羌活各四两,川乌、草乌、细辛、紫草、防风、独活、藁本、白芷、香附、当归、荆芥、肉桂、甘松、三奈、白芍、干姜、麻黄、皂角、甘草各二两,麝香三钱半,枣肉丸,弹子大,每取一丸,烧之”。而刘奎“除温方”^{[9]221}组方药物齐全,可谓晋唐以来烧熏预防用药的总结,曰“苍术一斤,降香四两,雄黄二两,硫磺一两,硝石一两,柏叶半斤,丹参二两,桂皮二两,藿香二两,白芷四两,桃头四两,五月五日午时收雄狐粪二两,头尖者是,菖蒲根四两,升麻一两,商陆根二两,大黄二两,羌活二两,独活二两,雌黄一两,唵叭香(如无,可减)、赤小豆二两,仙茅二两,朱砂二两,鬼箭羽二两,……米糊为丸,如弹子大,焚一丸”。

由以上可以看出,晋唐和明清烧熏用复方运用广泛,晋唐时期多用雄黄等药,自明开始辟瘟丹类方药则趋向于以大量芳香类药物组方,清代更趋于成熟。

3 涂抹

涂抹法是以药液或药膏直接涂于皮肤以发挥作用的外用法。《神农本草经》中就有雄黄“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胜五兵”^[16]的记载。在晋唐时,雄黄多合朱砂、石菖蒲等入药。如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雄黄散辟温气方》曰:“雄黄五两,朱砂(一作赤术)、菖蒲、鬼臼各二两。上四味,治下筛,以涂五心、额上、鼻人中及耳门”^{[4]175}。唐代王焘《外台秘要》记载的“雄黄散辟温气方”同上^[5]。明代王肯堂“用水磨雄黄涂于鼻上”^{[8]330},明代龚信“用雄黄末,水调鼻内。虽与病人同卧,亦不相染”^{[15]84}。清代《验方新编·咽喉》“辟瘟防护保身良法”中云:“涂雄黄酒于鼻孔中”^{[11]318},效果更佳。

总的来说,外用涂抹防疫的作用部位主要为鼻

及鼻腔,取以气胜气,俾邪气不得从肺而入,以免于感染时疫。晋唐多用以雄黄为主的复方,明清选药精简,多单用雄黄。

4 塞鼻

鼻气通天,疫邪易于从鼻而入,药物塞鼻防止邪气从鼻而入是防止疫病传染的重要途径之一。雄黄、赤散是塞鼻法运用较多的方药。吴崑在《医方考》辟瘟法中说:“凡觉天行时气,恐其相染,须日饮雄黄酒一卮,仍以雄黄豆许用绵裹之塞鼻一窍,男左女右用之”^[17]。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辟温疫气》赤散亦可作此用,清代刘奎《松峰说疫》也运用的孙思邈赤散方^{[9]206},只是药物剂量有所削减。此法明清时期开始广为流传,吴崑取雄黄气悍能辟恶邪,孙思邈、刘奎用赤散取其辛温芳香能辟秽。

5 取嚏

取嚏法是通过刺激鼻腔,使人连续不断地打喷嚏,从而达到祛除病邪治疗疾病的治疗方法。清代丁尧臣说:“雄黄、苍术共末,香油调涂鼻孔。既出病家,用纸条探鼻取嚏并饮雄黄酒一杯(烧酒尤妙)”入病家不染疫^[18]。取嚏用复方有刘奎自创透顶清凉散、沈金鳌所载通气散、鲍相璈搐鼻散。清代刘奎在《松峰说疫·诸方·避瘟方》中曰:“凡遇时令不正,瘟疫流行,人各带之,或嗅鼻,可免侵染;白芷细辛当归明雄牙皂(等分)。共为细末,瓷瓶贮,勿泄气。用时令病者噙水口内,将药嗅鼻,吐水取嚏,不嚏再吹,嚏方止。已患未患者皆宜用”^{[9]206}。

张景岳对取嚏法的理论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认为“却邪之法,则如刺法论所云: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干邪。盖天牝者,鼻也,鼻受气天之气,故曰天牝,……气出于脑,谓嚏之,或张鼻以泄之,或受气于室,则泄气于外,而大吸精气以易之,则邪从鼻出,而毒气自散,此祛邪于外之法也”^{[7]284}。郑肖严亦曰:“如误触其气,急取逆风吹散之,此《黄帝内经》所谓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之法也。并宜时常用如意油拭鼻,以避邪气”^{[12]4}。取嚏法始于明清。

6 点眼

点眼药法是将药物直接点入眼部,以治疗各种眼病的一种外治方法^[19],清代鲍相璈曰:“冰片、麝香、飞过明雄、飞过朱砂各五分,牙硝一钱,共为细末,磁瓶紧收勿泄气,男左女右以少许点目大眦。用此入时疫病家则不沾染”^{[11]319}。清代张璐《张氏医通》将之命名为点眼砂^[20]。

以上3法,均为明清时期开始使用。

7 涌吐

涌吐即以药物吸入或内服,并可配合一定手法以取吐的治疗方法。凡邪实上焦,痰食气逆不通欲吐不吐者均可用此法祛邪以御病。较早记载用于取吐以预防瘟疫的方剂为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赤散方^{[3]42},曰若时疫“初觉头强邑邑,便以少许纳鼻中,吸之取吐”。到清代刘奎在《松峰说疫》中提出了“于春分日,用远志去心,水煎。日未出时,东面饮二盅,涌吐,则疾疫不生”^{[9]213}的方法,不再使用细辛、附子等大毒之品,用药更安全。

8 粉身

粉身法是将药碾碎,筛细末,或与米粉调和,撒扑肌肤的外用法。晋唐医家多采用葛洪赤散方、“姚大夫粉身方”。全方芳香辟秽,外作用于皮毛,内合于肺脏,肺气充实,腠理固密而能抵御疫邪。清代刘奎将千金粉身散加川芎、零陵香(熏香),改为煎汤洗浴^{[9]214}以御时邪,使作用更加直接。

9 洗浴

药液洗浴是用药液或含有药液的水洗浴全身或局部的一种方法。《普济方》治时气瘴疫浴汤方曰:“桃枝叶(十两)、白芷(三两)、柏叶(五两),上为散。每服三两。煎汤浴之。极良”^[21]。清代刘奎《松峰说疫·诸方·避瘟方》曰:“于谷雨以后,用川芎、苍术、白芷、零陵香各等分,煎水沐浴三次,以泄其汗,汗出臭者无病”^{[9]214}。晋唐多用单方,多以桃树枝煎汤洗浴;明清在继续使用桃树枝汤洗浴的同时,更偏重于芳香类药物使用。

10 熨法

熨法是把药物加酒、醋炒热,布包熨摩患处,使腠理疏通而达到治疗目的的在一种方法^[22]。清代医家将此法用于防疫时,用法略有所变化。如清代郑肖严《鼠疫约编·验方篇·辟疫验方十二则》“治疫气传染方”曰:“凡入患疫之家,感其气入鼻内,即时布散经络。初觉头痛喉干,急用芥菜子研末,温水调末,填入肚脐中,隔衣一两层,以壶盛大热水,(开水亦可)频频熨之,至汗出自愈”^{[12]65}。

晋唐和明清瘟疫预防的方药和方法具有延续性,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明清时期的防疫用药是在晋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晋唐时期侧重于祛邪辟秽药物;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明清时期医家认为,“治法要当辟散疫气、扶正气为主”^{[8]330},且认为芳香药物具有增强正气的作用,故明清除继承晋唐大量驱邪避疫方药外,更集中和侧重于芳香辟秽药物的使用,并且雄黄、朱砂等一些具有一定毒性的药物多

做外用,内服运用逐渐减少。这种选方用药的改变,提示芳香类药在疫病预防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为现代急性传染病防治的方药和方式方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值得深入探讨。而芳香药物的使用与精油的使用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有可能促使突破目前中医药预防方式和方药相对局限的局面,从而开拓更为广阔的疫病防治研究空间,成为推动中医药疫病防治新体系构建的重要契机。

参考文献

-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14.
- [2]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疫病史鉴[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62-63.
- [3]葛洪.肘后备急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 [4]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 [5]王焘.外台秘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736.
- [6]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 [7]张景岳.景岳全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 [8]王肯堂.证治准绳[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330.
- [9]刘奎.松峰说疫[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
- [10]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
- [11]鲍相璈.验方新编[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
- [12]郑肖严.珍本医书集成(七)内科·类鼠疫约编[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 [13]苏敬.新修本草[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238.
- [14]黄宫绣.本草求真[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11.
- [15]龚信.古今医鉴[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
- [16]顾观光.神农本草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52.
- [17]吴崑.医方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58.
- [18]丁尧臣.奇效简便良方[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81.
- [19]曾庆华.中医眼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78-79.
- [20]张璐.张氏医通[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903.
- [21]朱肱.普济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1584-1585.
- [22]李曰庆.中医外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47.

(收稿日期:2012-10-11;修回日期:2013-02-20)

[编辑:黄健]